

# 转型目标、顺序及动力机制：一个文献述评

赵志峰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作为一种大规模制度变迁,转型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难题:转型的目标是什么?转型的最优顺序应该怎样?转型的动力机制有哪些?本文对上述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概括,并对已有转型理论进行扩展和深化。

**关键词:**转型;转型目标;最优顺序;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7)05-0034-04

所谓转型是指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由此观之,历史上的转型不胜枚举,而且这些转型的结果往往造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所以每经历一次转型并非仅仅是相关于当时的兴衰,它常常是改变了之后的历史进程。作为大规模制度变迁,转型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难题:

第一,转型的目标。不论转型目标被相关各行为主体具体明确与否,对转型目标的争论总是十分激烈。在逻辑层面,只有当转型目标,至少是抽象的或模糊的目标存在之后,大规模制度变迁才会有方向,转型也因此才能展开;在实际层面,转型方向可以看作是相关各利益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发言权”的综合体现,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转型方向也可能渐渐改变。

第二,转型的最优顺序。在多项制度都需要进行变迁时,顺序问题成为转型的关键。由于影响转型的因素众多,最优顺序只能是一个权衡取舍的结果。

第三,转型的动力机制。将影响转型的所有机制进行内生性考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思路,也不符合现实。可以选择的方法是首先假定外生因素稳定,然后分析内生的演化机制,最后再从比较动态的视角来看外生因素变化对转型的内生演化机制的影响。

## 一、转型目标——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

自从乔舒亚·库珀·雷默将有中国特色的转型

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之后,彻底否定“华盛顿共识”的声音更加响亮了。有学者认为“‘北京共识’的问世,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失败”。<sup>①</sup>这种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完全对立的观点,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然而在进行经济解释时,笔者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

第一,“华盛顿共识”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转型目标的设定:(1)价格自由化;(2)国有企业私有化;(3)约束政府的行为。其二是转型过程的设计,以目标实现为前提,强调“大爆炸”的转型方式比渐进主义包含更多的不可逆转性。随着俄罗斯及东欧一些国家在选择“大爆炸”转型方式之后,经济出现了长期衰退,学者们纷纷对“大爆炸”式的转型设计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对“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转型目标却依然保持相当的共识。<sup>②</sup>

第二,“北京共识”可以被概括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sup>③</sup>“北京共识”的核心在于:转型的最终目标未被提前设定,转型的过程是自主设计、渐进发展的。由于转型目标并未设定,所以“北京共识”并非一定与“华盛顿共识”相左,而且从经历的改革进程可见,两者在目标上有较多的一致性。

第三,比较而言,“华盛顿共识”是以转型目标实现为核心的见解,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在

收稿日期:2007-07-26

作者简介:赵志峰(1977-),男,河北邯郸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制度经济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研究。

逻辑上有很好的-致性;“北京共识”是以转型过程稳定为核心的见解,是一种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念,在实际中更具可操作性。就整个转型而言,最后的结果未必是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或许有可能将两者统一、融合,以一种可操作的手段实现理想的变迁过程。<sup>④</sup>

宪政转型是被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支持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认识到转型应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等等,就无法全面评价每一步转型的意义。支持激进式改革的学者对宪政问题非常敏感,<sup>⑤</sup>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意识到:“双轨制的经济转型模式可能为实现宪政转型带来长期成本,而这一成本可能高于双轨制赎买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收益”。<sup>⑥</sup>虽然双轨制(或称渐进式)转型在长期可能存在以上三位学者所担心的问题,但仅就目前而言,无疑采用渐进式改革的国家经济动荡的幅度明显要小,而且渐进式改革本身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sup>⑦</sup>所以,笔者认为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机制会使渐进式转型进入全面国家机会主义,而什么机制或许能扭转这一发展趋势?

## 二、转型的“最优顺序”

樊纲与胡永泰最近对转型的顺序进行了新的阐述,核心观点是:整体制度体系改革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顺序”,而在于“协调”(即制度间的互补机制),为了降低改革过程中的“不协调成本”,“应该在所有制度领域尽可能早地开始推进改革”,<sup>⑧</sup>所以“平行”改革是重要的;此外,他们也认为“不要指望任何一次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完成”,<sup>⑨</sup>改革应该逐步“推进”,而不是一步到位。所以,“平行推进”是一个较好的改革策略。

“平行推进”的改革理念没有错误,然而在现实中它的可行性却无法保证。“平行推进”隐含了一个关键的假设前提,即所有制度间的互补性是被预知的。当这一前提被满足时,“平行推进”是理想的改革模式,既避免了“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混乱,又绕过了“循序渐进”<sup>⑩</sup>式改革对制度间互补性的破坏所带来的损失。然而,制度间的互补性是否可以被准确预知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制度间互补性的知识会在转型的过程中显露出来,所以“平行推进”与其说是改革的出发点,不如说是渐进

式改革的一个发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两项具有互补性的制度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同时出现,其政策含义可能并不仅仅在于相关主体不知道“平行推进”的价值,而更可能在于没有“动力机制”促使其出现。

在某些条件下,转型是存在最优顺序的。<sup>⑪</sup>这里只作简要地说明:当存在“总和不确定性”<sup>⑫</sup>及“制度间互补性”时,“渐进主义”与“大爆炸”之间存在着权衡取舍,“渐进主义”比“大爆炸”更可接受仅仅是因为它满足了富有信息这一条件。在罗兰的讨论中,这一信息优势主要是指“成本较低的早期逆转”信息。<sup>⑬</sup>延续这一思路,在“渐进主义”较“大爆炸”占优的条件下,如果两项改革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同的,那么更富有信息的改革应该先进行。

与罗兰强调的渐进改革提供了“早期逆转”信息不同,笔者认为渐进改革所提供的信息有更为广泛的含义,“早期逆转”信息只是次要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渐进改革对行为人的决策参数的渐进改变。例如:当 $EF(O_{1j}, O_{2k}) \ll 0$ 时,完成改革1、2之后由于自然状态 $O_j, O_k$ 决定的收益的期望值很小,同时完成改革1、2是没有吸引力的;但如果先完成改革1,由于改革1的完成提供了相关的信息,改变了行为人的决策参数,此时若 $EF(O_{1j}, O_{2k}) > 0$ ,那么再完成改革2就是有吸引力的决策。正如张旭昆的分析:“如果人们在1978年就预见到中国改革最终会威胁到国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许多人当时也许就不会投票赞成改革了”。<sup>⑭</sup>由此说明,随着知识或信息的积累,渐进式改革使行为人的决策参数发生改变,从而推动改革可以顺利进行下去。

## 三、转型的动力机制

转型的动力机制可以分为转型方式的决定机制和转型过程的演化机制。前者重点分析在起点时转型方式的选择,例如是采用“渐进”方式还是采用“激进”方式;后者主要针对“渐进”转型方式而言,分析渐进的演化过程。

周冰、靳涛提出“综合因素决定理论”来解释转型方式的选择,具体分析了转型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各自在决定转型方式中的作用。<sup>⑮</sup>可以说这种思路是对这一问题较好的处理方法,兼顾了内生的初始条件和外生的决策人的行为偏好和能力。笔者反对这样一种倾向,即完全从内生因素来解释历史上某一时点,特别是关键时点的现象,<sup>⑯</sup>因为这一历

史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行为主体或行为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而这是内生因素所无法解释的。比如中国起初选择改革开放,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状态已经恶化到极点,而是以政治决策层的更迭为背景,后者对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解释力似乎更强。但是,如果要解释某一历史时点决策的后果(或效果)时,内生因素依然有充分的解释力。与解释时点现象不同,在解释一个历史过程时,我们可以区分内生的客观条件与外生的偏好选择,在某一时期可以假设外生偏好不变,分析内生的演化机制,之后以比较动态的方法分析外生偏好改变对内生演化机制的影响。

杨瑞龙对中国转型机制有一个连续的、不断深化的解释:在转型初期,由于传统体制的特殊性,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但也构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将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这一模式被概括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当对私人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能够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和更多的财政收入时,这种“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可能最终过渡成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sup>①</sup>黄少安指出杨瑞龙的一些逻辑缺陷,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指出制度创新总是涉及多个主体,在不同主体进行联合的过程中,主体承担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sup>②</sup>周业安从另一角度认为中国制度变迁的主旋律是以政府选择为代表的外部规则和以社会成员选择为代表的内部规则相互冲突,并导致外部规则逐步退出的过程。<sup>③</sup>

事实上,在分析经济转型的动力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转型决策权的界定,也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性质的界定。有两种观点是不完善的:一是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赋予其生命,使国家有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及目标,很显然这是一种主观空想的观点,不会为我们分析现实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二是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国家会按照集体博弈的结果行动,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一个特殊的博弈参与方——政治家。政治家的利益不在于其他方面,而在于维护其政治权力本身,“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

响”<sup>④</sup>。这里并不暗指政治家一定是独裁者,而是说明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家的权力与全民的权力是有差别的。如果一项制度变迁是由全民支配,那么可以忽略政治家的存在,就类似上面第二种观点,国家仅仅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工具;如果一项制度变迁是由政治家支配,那么在政治家最大化个人效用的要求下,其会“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的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sup>⑤</sup>;如果一项制度变迁是通过某种规则,由政治家与全民共同决策,那么这一规则所规定的内容就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国家的性质会决定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从而最终影响转型的方向。

#### 四、结语

转型过程的理想状态是:“在不产生过多经济混乱的前提下,让所有这些复杂的变化发生”,<sup>⑥</sup>但令人遗憾的是,实现这一目标是有困难的,因为转型过程面临“目标确定性”与“过程稳定性”的两难选择。“目标确定性”是指转型目标的明确及实现程度;“过程稳定性”是指转型过程中经济波动及社会动荡的程度。激进的转型方式目标明确,并且以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然而却面临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甚至是国家解体的危险;渐进的转型方式过程较为平稳,然而目标模糊,转型可能终止于任何阶段。<sup>⑦</sup>或许转型没有平坦大道,有的只是权衡取舍,一切只能等待将来评判。

#### 注 释:

- ① 田春生:《“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初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1期。
- ②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 ③ Joshua Cooper Ramo: Beijing Consensus,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 ④ 这一理想状态能否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转型内生的演化机制,另一方面取决于外生因素的变化,包括人们的主观选择。在渐进式改革道路中,转型过程有多种收敛结果,如果考虑外生因素的变化,理想的结果也许可能会实现。
- ⑤ 宪政理念在当今西方世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道理何在?不同的社会科学对此解释各异。从经济学视角,可以作如下推断:如果承认创新对经济增长是决定性的,那么激励创新的制度则是有价值的。创新需要每个人发挥

潜力,但是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好并不是只有发挥潜力一条路可以选择,人们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寻租。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每一个人的权力(特别是政府的权力),同样也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所以宪政体制试图使每一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力,当做不到这一点时,就使权力可以相互制约,结果权力不会为个人带来特殊的利益,人们只有发挥个人潜力为他人或社会创造财富才会得到报酬,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 ⑥ Sachs Jeffrey, W. Woo, and X. Yang: *Economic Reform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1999.
- ⑦ 哈勒根、张军:《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 ⑧⑨ 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及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 ⑩ 特指一项改革完成之后,再进行另一项改革的转型模式。
- ⑪ Dewatripont, M. and G. Roland: *The Design of Reform Packages under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1207~1223.
- ⑫ “总和不不确定性”可以理解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包含了经济代理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的存在,而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
- ⑬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 ⑭ 张旭昆:《论制度的均衡与演化》,《经济研究》1993年第9

期。

- ⑮ 周冰、靳涛:《经济体制转型方式及其决定》,《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 ⑯ 当然,内生因素对历史时点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不一定是充分的,从而不能保证必然的逻辑联系。
- ⑰ 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 ⑱ 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 ⑲ 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 ⑳㉑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见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㉒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 ㉓ 有人可能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为目标模糊的渐进式转型进行辩解,然而要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建立在自由宪政体制的前提下,而转型恰恰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没有自由宪政的前提下,很难说渐进式转型和自发秩序有什么联系。

(责任编辑:卢圣泉)

## The Target, Sequence and Momentum Mechanism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ZHAO Zhi-feng

(Economics School,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large-scale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ic transition poses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for scholars to study further: What is the target of economic transition? What's the optimum sequence of the transition? What are the momentum mechanisms for the transition? This paper makes a literature review related to the questions above and makes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expanded and deepened.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target of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ptimum sequence; momentum mechanism